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深化（上卷）

“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

郑杭生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四

中国特色社会学 理论的深化（上卷）

“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

郑杭生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郑杭生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学顶天立地观

踏遍中国
草根立地
超越本土
前沿顶天

郑杭生

气和文蔚
二〇一〇年五月

中国社会学的主要任务

运行转型
本土互构
实践结构
五论渐显

郑杭生

气和文蔚
二〇一〇年五月



2004年河北定县再调查时与博士生合影（右起）：章东辉、张永华、汪雁、郑杭生、何珊君、张鸿雁



2004年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审会上与文科一组成员靳辉明（前中）、叶朗（前右二）、王利明（后右一）等合影



2004年参加奥运总体影响研究（OGGI）项目社会课题组合影，前排右起陆益龙、郑杭生、李树旺，后排右起张春、刘精明、钟新、冯仕政



2004年在浙江师范大学讲学时与校长梅新林教授（左二）、政法学院院长王珉教授（右一）、副院长卢福营教授（右二）、张兆曙博士（左一）等合影



2004年在厦门大学讲学



2004年参加由宋健、曲格平主持的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课题的论证评议会时与宋健同志（中）、邬沧萍教授（左）合影



2004年在昆明召开的《民族社会学概论》编写研讨会上的合影



2004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全体会议上做主题报告



2004年作为中国资深理论家代表团成员访问朝鲜



2004年作为中国资深理论家代表团成员访问印度



2004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全体会议上与其他两位作主题报告的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施卢赫特(左)和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欧门(右)在一起



2004年作为中国资深理论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俄罗斯



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第一次会议成员合影(右起):李培林、景天魁、陆学艺、郑杭生、赵勇、李强、王思斌



2004年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第一届博士生徐晓军(左一)、蔡志海(左三)、陈秀峰(右二)见面,参加见面的有系主任江立华教授(左二)、党总支书记夏玉珍教授(右一)



2004年与北京市社会学会一些领导同志在春节前一起看望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名誉会长、百岁老人雷洁琼前辈



2005年在中国社会学会2005年合肥学术年会上与名誉会长、各位副会长和秘书长合影(左起):王思斌、刘敏、赵子祥、郑杭生、陆学艺、李培林、谷迎春、卢汉龙、蔡禾、潘允康、李强、谢寿光



2005年在追思费老学术思想座谈会上与洪大用教授(右)、香港中文大学李沛良教授(左)合影



2005年凤凰网《冷暖人生》节目直播郑杭生对话陈晓楠



2006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学国际会议期间访问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与文军（右）、罗国振（左）等教授合影



2006年在里约热内卢巧遇林南教授夫妇



2004年与当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杨敏（右）、张春（左）合影



2005年与当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吴平清（左一）、刘仲翔（右一）、仓理新（左二）、何珊君（右二）、汪雁（左三）合影



2006年与当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王道勇（左二）、张永华（左一）、张纯俐（右二）、潘鸿雁（右一）合影



2006年在上海大学与邓伟志教授（中）、李友梅教授（左）合影



2006年在首尔东亚社会学会上与张宛丽（右一）、陆学艺（右二）、杨敏（左一）等教授一起同韩国社会学会会长金成国（中）合影



2006年在首尔东亚社会学会上与李强教授合影



2006年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张杰教授来访



2006年在苏州大学讲学时与社会学院诸同仁合影（左起）：高峰、张明、郑杭生、江作军、王俊敏、叶继红



2006年与江立华（左二）、秦在东（右一）等到武汉农村社区考察时的留影



2006年访问巴西时与中国资深理论家代表团团长雒树刚同志合影

2007年在长沙与石挺（左二）、向德平（右二）、夏玉珍（右一）、张立荣（左一）等一起会见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丁烈云教授（左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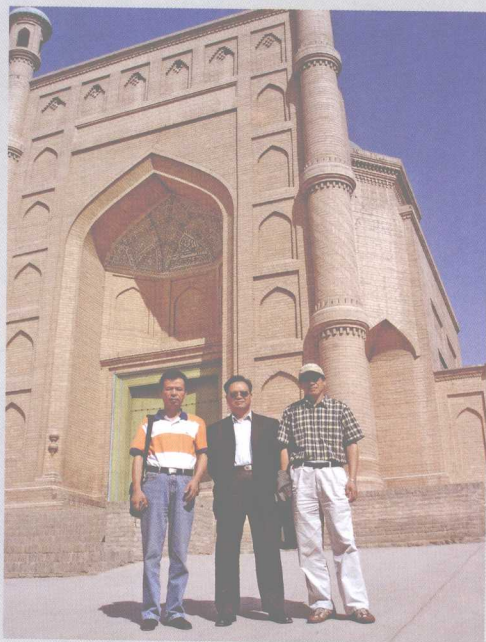


2007年在吉林大学参加国际研讨会时与社会学同行合影（右起）：田毅鹏、刘少杰、酆正、郑杭生、宫延华、张金荣、林兵、董在生



2007年在武汉科技大学讲学时与党委书记刘华才教授（右二）、文法与经济学院院长邓泽宏教授（左一）、基金会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秀峰博士（右一）合影

2007年在吉林大学参加国际研讨会时与刘少杰教授（左一）一起同韩国社会学会会长金成国教授（左二）、日本社会学会会长YAZAWA教授（左三）、韩国首尔大学韩相震教授（左四）等合影



2007年南疆之行时与庄孔韶教授（右）、迪木拉提教授（左）在库车大寺前合影



自序

—

时间过得真快！2005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本^①，至今已经问世4年多了。三卷本所收集的文章截至2003年，至今也6年了。从2004年初到2009年底这6年中，笔者独立写作、与学术团队成员合作写作的文章，也已达到80万字左右了——与前三卷每一卷的分量差不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策划者们，及时提醒我该出第四卷了。这样我就开始整理能够表明这6年社会学历程的文章，进行归类，并定名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

促使我在着手这一工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周年，作为与共和国、与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共命运、同呼吸、齐成长的学者，以此向共和国、向改革开放、向中国社会学献礼，是很合适的。

此外，前三卷出版时，正是我70周岁前夕，当时开了一个题为“中国特色社会学——历史·现状·未来”的学术研讨会，以此作为那一段24年左右学术历程的记录和小结；四卷明年——2010年问世时，正当我75岁前夕，我想也同样可以作为这一段6年学术历程的记录和小结，也是我进入社会学30周年的记录和小结。

本书定名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强调了“深化”、“实践结构论”、“理论自觉”。

^① 卷一、卷二、卷三的书名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的前沿问题》。

所谓“深化”，是相对于前三卷来说的，就是说，无论从理论内容来看，还是就深层理念、前沿意识、草根精神、世界眼光、本土特质、理论自觉来说，第四卷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化。可以说，“深化”集中体现在“实践结构论”、“理论自觉”上。而且，其中“理论自觉”是一根可以把其他“深化”串起来的线索。

“实践结构论”的提出，集中表现了理论内容本身的深化。21世纪以来，我们越来越感悟到当代社会实践发生的结构性巨变及其具有的两股巨大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的力量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的力量，当今世界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毫无例外地都包含着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我们将这种对实践的感悟加以理论提炼，形成了“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概念，并把研究这种结构性巨变及其两维效应的理论称为“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两维视野和双侧分析”，简称“实践结构论”。

“实践结构论”表明了理论与实践的互构。一方面，实践的结构性巨变一直在自我积累，并且越来越向学术和思想领域产生强有力的折射，向理论界和学术界提出了诸多前所未有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不仅实践问题大量地转变为理论问题，而且理论问题也大量地进入到了实践领域之中，通过不同观点的讨论、争辩和反思，给实践以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和出路。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确信，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已经再次获得了新的推进力量。对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也是在这种力量的推进下进行的，它标志着我们在社会学理论方面转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即是说，在以前提出的四个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基础上，我们的探索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当然，我们对“实践结构论”的探索还是初步的，它还不像前四论那样成型和系统，后续的工作还在进行。因此，我们使用了“‘实践结构论’的提出”这样的用语。

“理论自觉”概念的提出，受到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启发，但同时“理论自觉”又有与“文化自觉”不完全相同的特殊性。综合“理论自觉”的各个要素，可以把“理论自觉”简要地规定为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理论自觉”范畴一经形成和提出，就有这样那样的方法论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既为回顾，又为瞻望，也为观察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度提供新的概念工具、新的理论视角。

回想起来，应该如实地说，我的“理论自觉”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如果追溯起来，大约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英国进修时算起，

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是当时还没有形成“理论自觉”的新概念，还没有意识到可以用这个新概念来梳理自己的以至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历程。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理论自觉”轨迹上的新起点、新境界，即“理论自觉”的意识更明确、更强烈，实行更主动、更坚实，并进入了对“理论自觉”本身的思考和研究。

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有必要联系学界的情况，简要地回顾一下笔者自己经历的“理论自觉”的轨迹。

二

总起来说，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的提出和论证，其实都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一个的轨迹点、支撑点。这些理论都是运用世界的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开发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其中有几点需要着重加以强调。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的探讨

我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最初集中表现在 20 世纪 80 年初，即差不多 30 年前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的探讨上。这个探讨与社会运行论的形成密切相关。当时我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维护建设型的社会学。这一划分，为社会运行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争得了学术的和现实的立足空间。这是因为，上述观点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简单化的理解，即片面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只讲斗争，不讲和谐，只讲革命，不讲建设。肯定了在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主要是维护建设型的，那就为以研究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规律为己任的社会学争得了地盘。如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还是像新中国成立前一样是革命批判型的，那么就很显然，以研究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以研究社会和谐为己任的社会学就很难拥有相应的地位。

现在看来，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二种形态叫做“维护建设型形态”的社会学，不如把它叫做“建设反思型形态”的社会学来得好。因

为“建设反思型形态”能够更好地既体现它继承了第一种形态——“革命批判型形态”的精神，其中的“反思性”与“革命批判性”相通，又表明了它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即在新社会把重点转移到“建设性”上。这能减少因为“维护建设型”中“维护”这个词而引起的种种误解。因此，我要郑重声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设反思型”的社会学。

上述观点之所以说是一种“理论自觉”，是因为它既是对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建设性反思的结果，又是对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进行建设性反思的结论。在旧中国，同样存在这两大系的社会学。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从推翻旧世界到建设新社会的转换，这两大系社会学都面临各自的转型：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要从革命批判型形态转换为建设反思型形态；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要从实际上维护旧社会转变为维护新社会。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不仅这两个转型的任务没有被提出来，社会学作为学科反而被取消了27年之久，造成种种有形无形的重大损失，直到1979年在邓小平的主导和强调下才得以恢复重建。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其影响不限于社会学，对正确对待整个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提供某种启示。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从推翻旧世界到建设新社会的转换，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把重点从以革命批判地破坏旧世界，转移到以建设反思的精神来建设新世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①可惜的是，这一宝贵的思想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表明，我们取得的成绩，都与正确处理破坏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推翻旧制度与建构新制度的关系紧密相联，而我们的失误则与没有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有关。在很长时间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推翻旧世界的方式来建设新世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真正落实毛泽东上述宝贵思想的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们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探讨着如何实现“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步一步推向

^① 《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前进。无论是邓小平提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也无论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并创造性回答的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都与“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即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社会主义紧密相联，都是探索这一总问题答案中的一个一个轨迹点。正是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一个崭新的中国出现在世界、屹立在东方。在这个意义上，从社会学视角看，我们也可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继承并发展了“革命批判型”的“建设反思型”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在制度创新、价值重塑、阶级阶层等课题上，在官民矛盾、党群矛盾、劳资矛盾等问题上，我们仍面临多重挑战和风险。在这些问题上，如果发生重大失误，就会引起这样那样的社会不稳，甚至动荡。

总之，在取得革命胜利后，执政的条件下，必须有一种既继承“革命批判型”又发展“革命批判型”的“建设反思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关于上述这些问题，笔者在收入本书的《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①等文章中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二、对“价值中立”的具体分析

如果说，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探讨，属于“理论自觉”中对自己的理论的反思，那么，对“价值中立”的具体分析，则属于“理论自觉”中对西方社会学中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方法论原则的批判性审视。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价值中立”被说成是金科玉律，被看做是判断懂不懂社会学的一个标准。在那种情况下，对它提出异议，是颇受质疑的，是要有点勇气的。当年，在一些答复文章中，我批评了“价值中立”的悖论：一方面坚持价值中立——不应有任何价值观，同时又坚持一种地地道道的价值观——“价值中立”的价值观。谁只要坚持“价值中立”，谁就无法摆脱这个悖论。^②后来，我说过这样一段小结性的话：“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

^① 本文由郑杭生与杨敏合作写成，杨敏为第一作者，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2007（2）。

^② 参见郑杭生：《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序董驹翔主编的〈社会学〉·答我的一些批评者》，载《社会科学研究》，1991（4），又载《社会科学研究》，1991（5）。此文后被收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① 这应该看作是中国社会学从西方强势社会学中解放出来这一过程和趋势的重要一步，也就是“理论自觉”过程和趋势的重要一步。

对这一问题，笔者在收入本书的一些文章中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三、对与前沿意识相结合的草根精神的提倡

这些年，我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

草根精神的培育和实现主要是跟社会学的实地调查分不开的。笔者根据“中国经验”由三个层次——中央、地方和基层构成和相互推进的社会事实，相应于地方层次和基层层次，分别设计了两个系列的实地调查研究丛书，把我们团队依据调查研究成果概括总结的后两个层次的“中国经验”表达出来。第一个系列是由我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丛书，这套丛书目前已经出版：郑州卷，书名是《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探索——以郑州市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

^① 参见郑杭生：《究竟如何看待“价值中立”？》，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1）。此文后被收入《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

特色分析》^①；广州深圳卷，书名是《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深圳实地调查为例的广东特色分析》^②；第三本是以上城区为代表的杭州卷，书名为《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杭州“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③。第二个系列是“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也是由我担任总主编。其中第一本书已于去年年底完成，书名为《“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④。第二本书名为《“三化两型”城市：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以郑州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⑤。

在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次中，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

笔者设计的上述两个系列，代表了对后两个层次的社会学探讨和解读。我们通过调查，具体考察我国东中西部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和基层已经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分析他们取得的进展，他们碰到的问题，他们获得的领悟，他们产生的困惑，为进行比较提供事实基础，没有这种深入基层的草根精神，无从进行“特色分析”。我们在考察中，体会到各个地方、各个基层的做法，探索的深度、广度，探索的自觉性，都有差别，但他们都在探索和创新；体会到我国社会能够在快速转型中、在改革发展中长期保持稳定，是与他们付出的劳动分不开的。我接触了不少领导、社区工作者、城乡社区居民，与他们共享制度创新成功的喜悦，共同梳理其中的问题和教训，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也为自己的社会学研究汲取了许多新鲜的养料。调查组的团队，基本上由我在读的和少量已经参加工作的博士生组成。他们参加调研活动后，感到收获很大，了解了实际，进一步理解了中国基层是如何实际运行的，也改变了过去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在不少方面矫正了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获得了反思自己、审视西方的新的立足点。我也把这些实地调查中的某些

① 该书由郑杭生、杨敏主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② 该书由郑杭生主编，段华明、杨敏副主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出版。

③ 该书由郑杭生主编，杨敏、黄家亮副主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出版。

④ 该书由郑杭生、杨敏、吴平清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⑤ 该书由赵君、杨敏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出版。